

汉代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发展

HANDAI JINGXUE LIUBIAN YU RUXUE LILUN FAZ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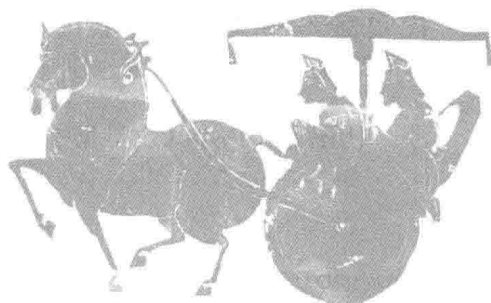
梁宗华 ●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批准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

02BZJ04
资助出版



汉代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发展

HANDAI JINGXUE LIUBIAN YU RUXUE LILUN FAZHAN

梁宗华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代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发展/梁宗华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 - 7 - 209 - 10503 - 3

I. ①汉… II. ①梁… III. ①经学—研究—中国—汉代 ②儒学—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Z126. 273. 4
②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8944 号

汉代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发展

梁宗华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65 号
邮 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17. 25
字 数 25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
ISBN 978 - 7 - 209 - 10503 - 3
定 价 45.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言	1
-----------	---

上 编 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的拓展

第一章 前溯：秦朝禁儒运动及其社会后果	13
一、对法家思想的历史选择	13
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理论构想与焚书坑儒	17
三、禁儒运动的社会后果	22
第二章 西汉初期儒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经学背景	31
一、汉初政治与儒学用世之实践	31
二、黄老之学成为治国指导思想	36
三、儒家遗经的复出与传授	44
第三章 陆贾的儒学理论构建	54
一、谋士身份与经史的学养	54
二、“助以无为”的仁义观	57
三、对重民思想的继承发展	61

四、熔铸法家学理	64
五、重构儒学的时代因缘	66
第四章 贾谊的儒学理论构建	71
一、“礼以为本”的礼治思想	72
二、“民以为本”的民本思想	78
三、贾谊儒学观转化的时代因缘及其意义	82
第五章 董仲舒新儒学体系与儒术实践	86
一、董仲舒与公羊学	86
二、天道观之构建	88
三、仁义观之重铸	93
四、人性伦常之支撑	96
五、儒学重构的意义	101
六、公孙弘的儒术与政治实践	103
第六章 司马迁视域中的经学与儒学	106
一、《春秋》经与史学传统的人文精神	106
二、司马迁的儒学观	113
第七章 《盐铁论》的儒学价值观及其学术意义	117
一、盐铁会议与《盐铁论》成书	117
二、论辩主旨：尚仁义与务权利之争	121
三、《盐铁论》所透显的经学发展状况与儒学精神	124
第八章 扬雄对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130
一、对孔孟儒学及诸子的评判	130

二、儒学思想体系的构建·····	135
第九章 班固《汉书》所彰显的东汉儒学精神 ·····	142
一、儒家思想成为品评人物的唯一标准·····	142
二、儒家的政治理念规约着对史事的评价·····	147
三、历史观所透显的儒家精神·····	153
四、儒学理念影响下的忠奸类型形象·····	166
第十章 郑玄经学的意义 ·····	177
一、文化生命的人格涵养·····	177
二、齐整百家的经学成就·····	183

下 编 独尊儒术对道家、道教的影响

第十一章 独尊儒术对道家发展方向的影响 ·····	193
一、董仲舒与道家黄老学·····	193
二、独尊儒术对黄老道学发展方向的影响·····	205
三、谶纬神学对道家宗教化的影响·····	211
第十二章 经学诠释影响下的早期道教经典（上）：《老子想尔注》 ·····	219
一、《老子想尔注》之“道”的诠释·····	219
二、“道诫”之为中介 ·····	224
三、长生不死的核心信仰·····	227
第十三章 经学诠释影响下的早期道教经典（下）：《太平经》 ·····	232
一、对“道”的改造 ·····	232

二、对“元气”说的改造	235
三、建基于“气化”论基础上的神仙系统	238
四、“守一”养身的长生理论	241
第十四章 东汉后期的儒道融合	246
一、现实应用与社会批判	246
二、经典诠释所呈现的儒道融合倾向	251
附 录 《后汉书》对东汉经学与儒学发展的总结	259
一、“正史得失”的史学意识	259
二、对东汉经学、儒学的总结	265
参考文献	268

引言

汉代儒学在整个中国儒学史上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和意义。这种特殊固然体现为儒学在此期的政治化与制度化，同时也表现在经学地位的官方确立，并且直接影响到儒学理论的发展，进而影响到汉代思想学术的整体面貌。与先秦元典儒学不同，汉代儒学的发展与经学的演变紧紧纠结在一起，以至于长期以来学界常以经学指称儒学在汉代的发展特征。学界关注汉代经学流派及儒学思想的特殊价值，无论经学还是儒学研究都出现了一批颇具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有汉代思想史、经学史、儒学史方面的诸多专著面世，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经学与儒学不是完全等同的，二者有相当大的重合部分，亦有各自着力发展的领域。现有成果较少关注经学与儒学特殊的互动关系及双向影响，较少从经学与儒学互动的角度审视汉代经学对儒学理论发展的特殊意义。大部分的研究仍然呈现或以经学代儒学，或者经学自经学、儒学自儒学的状态，经学与儒学呈条块分割的研究框架。汉代经学与儒学理论发展之间互动、影响问题的重要及目前学界研究之阙如，促使我们属意于“汉代经学与儒学的双向互动”问题，冀以此给予汉代经学与儒学的关系以一种内在、系统、宏观的把握与揭示，进而探究其对于汉代思想学术整体面貌的影响。

—

两汉常被称作儒学发展的经学时代。“经”原只是儒家所尊崇的经典，汉代虽然是经学全面确立时期，儒学一家尊崇之典籍转成为社会共同尊奉的经

典，但研经之学不能等同于儒学理论的创发，两者并不能互相代替；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罢黜百家，“儒术”和儒学显然不能完全画等号，而经学在某种意义上更倾向于与“儒术”的对接，汉初陆贾在《新语》中就曾有论，“表定六艺，以重儒术”（《本行》）。

六艺经典实际在先秦已成为中国文化载体，在孔子对《诗》《书》等六种典籍进行系统删定整理并以之教授学生之后，“六经”已经成型，只是那时尚未有经学之名。据先秦文献记载，在战国中期，“六经”的基本特点及功用已为世所公认，排序基本稳定；而在后期，“六经”之名也成为人所熟知的概念，以下几种文献资料可证：

郭店儒家简《六德》中已成组地论到六艺典籍与六位、六德的关系：

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①。

君臣父子夫妇六位，对应六德，在《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皆有体现，换言之，六种典籍之中蕴藉着深厚的六位、六德的理念，可藉之进行深入阐释。

《礼记·经解》篇则述及孔子论六经之教化功效：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

^①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这段文字从不同侧面反复论说了六艺典籍的不同作用及对人之整体素质的浸润影响，剖判在经典学习过程中所易犯的错误流弊，强调只有深研精思，才能得六艺之教的精髓，做到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絜静精微、恭俭庄敬、属辞比事，而避免愚、诬、奢、贼、烦、乱等弊端。三次出现的典籍顺序，第一次和西汉六经次序完全相同，第二、三两次稍有差异。

《庄子》中出现了明确的“六经”概念。《天运》篇中，“六经”之名出现两次，一则是孔子所言，“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而老聃应之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做过周王朝史官的老聃，自是熟稔这些典籍的，故能有“先王之陈迹”的评判。另一则为《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顺序与前述《六德》《经解》《天运》同。所论其独特教化功效，在《荀子·儒效》篇中有相似表述，《儒效》称，“《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可见，战国中期以来，六艺典籍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且其各具特色的教化功能为时人所肯认，“六经”之名在战国后期已经出现。沿着这样的路向发展，“经学”之称亦已是呼之欲出了，但这一路径被秦朝的焚书坑儒给阻断了。

入汉之后，挟书律既除，因遭秦火及战火几遇灭顶之灾的六艺典籍及其他先秦古籍相继复出于世，六经之学各有传授，由此也可以看出战国至秦已有各经的承传统绪，此时只是接续而已。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遂有“经学”之名，倪宽与武帝“语经学”，是“经学”一词之首见。以现代学术视野观之，经学与儒学之间各有其着意用力的侧重方面。因为独尊儒术而兴起的经学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小学的内容，而作为诸子略中“儒家”存在

的儒学，着力点则在理论建构方面。这从汉代历史发展阶段中可见清晰呈现：董仲舒借助公羊学重构新儒学促成经学的繁荣，而西汉经学全盛之际的元成时期却缺少儒学理论、思想家的创发；至于西汉末今文经学陷入严重危机之际，扬雄发扬蹈厉，提倡向先秦孔孟儒学的复归，在儒学理论建构上又颇有创见。显然二者并不同步，经学与儒学有其相当大的交汇部分，亦有其各自注重的视域，这两者从来不曾互相代替，实际呈现双向互动的关系。

一般地讲，经学更重视典籍的训诂及史实的辩证，而儒学着意于学说理论的创发、思想体系的构建；表现在学者群体上，经学家作为儒者主要是学问家，而大儒在经学家的身份之外更是一个思想家。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之后，经学的地位正式确立，结束了先秦时期六艺经典仅为儒家一家尊崇之学的“准经学”阶段，经数百年发展，蔚成大观，成为中国传统所特有的学问。这固然是借助了儒学被树为官方的治国指导思想之力；同时，经学的教授形式、诠释方法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多重的影响，制约规定着汉代儒学理论的发展，进而影响了道家经典及其他典籍诠释的面貌，对后世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具有深远的意义及影响。

儒学作为先秦子学的一派，在确立独尊地位后，经典诠释成为其理论拓展的载体。事实上，在汉人观念中也并未把经学与儒学等量齐观。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六艺略”卓然立于卷首，既有“六艺略”之后，在“诸子略”中“儒家”又名列第一，“儒家”仍然以“子”的身份列于诸子行列；而在汉代被视为六经之源的《周易》也从来不是儒家的专属品，魏晋时期位列“三玄”，与《老》《庄》比肩，玄学家们在注《易》时更多阐释道家思想。

从整体来看，与先秦开创期的原始经学或称“准经学”相比，汉代今文经学已经有了质的改变。由于孔子以“六艺”为教材，先秦时期为其后称为“六经”的典籍作传记训解的，总体呈现以儒家学者为主体、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基本倾向；而汉代今文经学则显然不同，发生了大的转向。由于秦朝焚书坑儒，并殃及“百家语”，汉初开书禁，儒学遗经相继复出于世，“百家语”亦藉此复兴。此期对儒学遗经的传授大多出自齐学系统，齐学的开放性特点影

响及于今文经学重在阐释微言大义的特征，使得西汉前期经学实际渗透了多家学说。阴阳、五行、道、法、墨等诸子学说都借助经学的诠释而成为其中的“微言大义”，这就使得汉代儒学理论体系兼采百家具备了可行性及可信性，儒道互补格局基本形成，经注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主要载体，经学诠释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主要路径。而西汉末以后古文经学对抗今文经学，儒学理论构建则力图向先秦原始儒学理性精神复归，儒家学者再次转向道家思想寻找精神资源，促动了儒道互补格局的深入发展。

落实到具体的发展历程，儒学理论构建与汉代经学发展的几个阶段相互依存的特征非常鲜明。汉初儒家经典的复出与传授，构成了儒学复兴之学术背景与前提，陆贾、贾谊皆通数经，谙熟经学，但他们的思想承继先秦子学的精神特质，著作重心在儒学理论的探讨，陆贾重仁，贾谊倡礼。在他们这里，没有具体的解经著作，谙熟经学表现为在对儒学理论的探讨阐释中对经典的熟练运用，包括直接引用及大量的化用。

董仲舒是公羊学大师，其《春秋繁露》呈现一种独特的说经形式。他借助今文公羊学把诸子相关学说特别是道家黄老学纳入其思想体系，基本形成儒道互补格局。在董仲舒这里，既有对“礼”的重视，着意于制度层面的建设，成为汉代儒学制度化、政治化的突出代表；同时更有对如何贯彻“仁”的精神的深刻思考，董仲舒关于“天”的哲学，与其说是“神学目的论”，其实追究到底，毋宁说“仁学目的论”更能代表其“天”论的意义。这一阶段的发展，一方面可以说正是今文经学的昌明促成了儒学思想体系的重新建构；另一方面，董仲舒“新儒学”定于一尊，转而影响到经学特征的重要变化。经学官学化、政治化对于礼制建设起到了强化作用，经义转化为礼仪制度，促成制度层面“礼教”的形成，同时却无力显扬、贯彻儒家学说的另一理论精髓——“仁”的精神，而这又正是自孔子以来儒学思想家们所一直努力倡导的，是儒学理论的价值精义所在。

经学的这些变化发展到极致，就完全窒息了儒学的理性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于儒家思想“仁”与“礼”的核心价值精髓，经学用力于

“礼”，并较好地贯彻落实于社会政治实践中；儒学思想家们更心心念念地致力于“仁”的理论建构。西汉后期及两汉之际儒学思想家们致力于摆脱今文经学对儒学理论的桎梏，努力澄除经学中阴阳灾异、谶纬迷信的神学成分，冀以恢复原始经学阶段之“纯儒学”的面貌，推进儒学理论的发展，并由此促动了古文经学的兴起。东汉两百年今古文经学的抗争，实际是儒家思想理性精神复苏的学术储备。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古文经学对于儒学理论发展的意义，它关涉到东汉儒学独尊的真正实现及儒道互补格局的最终奠定。

二

以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为转折点，汉初鼎盛一时的黄老道学转向民间发展，并被迫转换方式，出现不同的发展路向。儒学融会道家思想自董仲舒开始已成为汉代学术发展的常态，治黄老的学者也转而从儒家理论的发展中汲取经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与神仙方术合流，演化为黄老道；作为今文经学歧出的谶纬，对道家宗教化则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董仲舒儒学中天人感应及灾异谴告思想，被言灾异的儒家学者发挥到极致，成为朝野上下议论时政、改革弊政、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及手段，不但成为今文经学的重要内容，更影响到黄老道学的转向。在道家思想神学化、最终宗教化形成早期道教的过程中，它从今文经学及谶纬神学中得到了很大启发，汲取了大量营养，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在理论基础方面，吸收了神秘的阴阳五行思想；在政治倾向性方面，以维护社会秩序、宗法制度的姿态出现，与儒学肯定贵贱有序、上下有等的礼制相一致；而天人感应论及灾异谴告说更成为道家宗教化的两大精神支柱，道教的天人一体及善恶报应说与此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

首先，早期道教理论吸收了大量的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老子想尔注》中有以五脏配五行的思想：“五藏所以伤者，皆金木水火土气不和也。和则相生，战则相克，随怒事情，辄有所发。”（第四章注）^①第六章注论阴阳

^①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则曰：“阴阳之道，以若结精为生。”在“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后汉书·襄楷传》）的《太平经》中，阴阳五行学说已成为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经》继承了阴阳和合而生万物的思想，提出：“夫生者皆反其本，阴阳相与合乃能生。故且生者，悉复其初始也。天地未分，初起之时，乃无有上下日月三光，上下洞冥，洞冥无有分理。虽无分理，其中内自有上下左右表里阴阳，具俱相持，而不分别。若阴阳相持始共生。”（《三者为一家阳火数五诀》第二百一十二）^① 阳施阴化，宇宙中一切事物的相生相养、运动变化都依赖于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缺一不可。

早期道教理论亦赋予阴阳以道德的属性，很明显地融汇了董仲舒儒学的阴阳刑德思想，并进一步神学化。《太平经》肯定自然万物“阳尊阴卑”，进而肯定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以阴与阳一一比附，确认其与天道的契合，“天之格分也，阳者为天、为男、为君、为父、为长、为师，阴者为地、为女、为臣、为子、为民、为母”（《天谶支干相配法》第一百五）。《太平经》又以刑德配阴阳，阐发“贵道德，下刑罚”的思想，“阳者好生，阴者好杀。阳者为道，阴者为刑。阳者为善，阳神助之；阴者为恶，阴神助之”“故君贵道德，下刑罚，取法于此。小人反下道德，上刑罚，亦取法于此”（《太平经钞乙部·录身正神法》）。

其次，早期道教理论大量吸收了儒家被神圣化、绝对化了的伦理道德规范及原则，把维护宗法秩序作为头等教戒，使得道教理论的超人间性立足于现实性和人间社会基础之上。《太平经》肯定汉儒视为天地之常经的伦理纲常，同样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太平经钞乙部·阙题》称，“三纲六纪所以能长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常吉”（《太平经合校》第27页）。有所变化的是，出于宗教神学的需要，它以“君、父、师”之三纲代替了儒家的“君、父、夫”之三纲，强调臣忠、子孝、弟子顺，《六极六竟孝顺忠诀》称：“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

^① 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

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名为三行不顺善之子也。”

道教具体的教戒信条中有许多与儒家道德相一致的规范。《老子想尔注》以道诫的形式使忠、孝、仁、义等儒家道德规范成为“道”的属性。《太平经》中肯定“父慈，母爱，子孝，妻顺，兄良，弟恭”的阐论比比皆是，“仁道”更成为被肯赞推许的对象：“是以古者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不以文刑杀伤服人也。所以然者，乃鄙用之也。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故天乃好生不伤也，故称君称父也。地以好养万物，故称良臣称母也。人者当用心仁，而爱育似于天地，故称仁也。此三者善也，故得共治万物，为其师长也。”（《分别贫富法》第四十一）可见，早期道教理论在维护伦理纲常、宗法秩序方面与儒学并无二致，它没有把自己放置在儒学的对立面，而是从儒学中汲取营养以与之抗衡。

第三，天人感应论及灾异谴告说构成早期道教理论的核心内容，其思想源头是多元的，儒学是其中一个重要来源。《老子想尔注》强调天人一体，认为至诚可以感天，进而强调只有累积善功，才能得到天的救助。《太平经》中多处发挥符命灾异思想，强调自然界的和顺与灾变正是人间社会政治好坏的反映，因为人类社会一切制度法令皆依“天道”而制，顺天道而行，尚德去刑，政治清明，就会有太平福瑞彰显之，反之亦然。在此基础上，早期道教理论提出“承负说”，以之解释实际存在的善恶与祸福不一致的现象，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理论。

经学的诠释方式及儒学的神学化则影响到早期道教经典的形成。早期道教经典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对道家元典的诠释，直接采用了经学的注疏方式，以《老子想尔注》为代表；其二是自造经典的路径，以《太平经》为代表，而这与经学中纬书的流行密切相关。两种道教典籍的形成都受到儒学经学化、神学化的影响。

综括来看，汉代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发展的这种双向作用和影响，形成了汉代思想学术的鲜明特色，汉代学术思想无一不打上其深刻的烙印，而且直接

影响到后代中国儒学史的特征——汉代以降，通过注释经典建立思想体系成为儒学思想家们理论建构的最重要的途径。通过在史的还原中观照经学与儒学理论发展的特殊关系，可以揭示出汉代历史进程中经学与儒学理论互相交融、背离的规律、意义及其对汉代政治、思想文化、社会思潮的独特作用和影响，进而明晰经学与儒学的这种关系对后世儒学理论发展所独具的意义。经学贯穿了自汉至清儒学发展史的始终，经典诠释成为儒学思想理论建构不可或缺的载体和手段，尤其是对于宋明理学而言，经学传统其实是不可须臾或缺的。经典注疏传统成为整个中国思想史的深刻烙印。

就东方儒学的大背景而言，汉代经学与儒学的这种互动关系影响所及其实已不止于中国儒学，它实际也存在于韩国儒学与日本儒学的发展历史中。韩国儒学与日本儒学理论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亦是主要以经典诠释为载体完成的，而且其民族化特征与经学、儒学的这种互动关系实际有着很密切的关联。因此，就整个儒学文化圈的研究而言，厘清汉代经学流变与儒学理论发展的关系亦有着切实的价值和意义。

